



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

魏晋南北朝文学卷

六朝风采远追寻

杨明
编选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

魏晋南北朝文学卷

六朝风采远追寻

杨明
编选



创立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朝风采远追寻/杨明编选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
2017

(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·魏晋南北朝文学卷)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490 - 1

I. ①六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古典文学研究-中国-
魏晋南北朝时代-文集 IV. ①I206.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3954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六朝风采远追寻

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·魏晋南北朝文学卷

杨 明 编选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490 - 1

2017年11月第1版 开本710×1000 1/16

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28.75

定价:80.00元

前 言

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,追溯起来,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,迄今一百年;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,则成立于1925年。1950年代之后,汇聚学界各路精英,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,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。1980年代以来,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(1981年)、古籍整理研究所(1983年)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(2005年)、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(2014年)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,学科体制更形多元、完整,教研力量更为充实、提升。

百年以来,复旦中文潜心教学,名师辈出,桃李芬芳;追求真知,研究精粹,引领学术。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,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,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,勇于开辟及突进,推展了知识的领域,转移一时之风气,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,相互之间尊重包容,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,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。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,承续前贤的精神,持续努力,成绩斐然,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,希望承而能创,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。

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,我们编纂本丛书,意在梳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,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。其中的文字,有些已进入学术史,堪称经典;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,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。

回顾既往,更多是为了将来。我们愿以此为基石,勉力前行。

陈引驰

2017年10月12日

出版说明

本书系为庆祝“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”所策划的丛书《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》之一种。该丛书是一套反映复旦中文百年学术传统、源流，旨在突出复旦中文学科特色、学术贡献的学术论文编选集。由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，所涉学科门类众多，作者语言表述、行文习惯亦各不相同，因此本馆在编辑过程中，除进行基本的文字和体例校订外，原则上不作改动，以保持文稿原貌。部分文章则经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。特此说明。

编辑部

2017年11月

目 录

魏晋时代的文艺思潮	刘大杰	001
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	章培恒	022
传叙文学底自觉	朱东润	040
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	李祥年	059
《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》引论	刘季高	067
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	邵毅平	077
魏晋南北朝赋的忧思精神	吴兆路	094
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	查屏球	103
关于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	章培恒	122
洛神赋：从文学到绘画、历史	戴 燕	137
“潘岳两次婚姻说”辨疑	周兴陆	174
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风的关系	王运熙	183
尘网中：陶渊明走向田园的侧影	陈引驰	187
陶渊明“回归自然”的思考 ——兼及中西“回归自然”论	徐志啸	210
东晋玄言诗与佛偈	陈允吉	217
吴声西曲杂考	王运熙	231
清乐考略	王运熙	272

范蔚宗谋反一事辨正	汪涌豪	294
孔稚圭的《北山移文》	王运熙	303
重读《世说新语》札记	蒋 凡	309
《世说新语》及刘孝标注与魏晋传记学	羊列荣	317
蜂腰鹤膝旁纽正纽辨	杨 明	337
略谈南朝骈文之难读		
——以任昉文为例	杨 明	347
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	骆玉明 贺圣遂	368
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		
——以萧纲、萧绎为中心	谈蓓芳	377
萧统诗歌真伪及相关问题	徐 艳 朱梦雯	391
论梁代诗人萧综	邹国平	406
《颜氏家训·文章》校读札记	张金耀	421
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校订释例	陈尚君	440
编后记		449

魏晋时代的文艺思潮

刘大杰

一、文学理论的建设

我在上面说过，儒家的人生哲学，是以修身与人格为基础，所以他们看重行为，远在言语与辞章之上。孔子说：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。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又说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这些话都是说明言语辞章的华而不实，容易掩蔽高贵的道德。到了儒教独尊的汉代，孔子的这种观念，作为学术批评、人生批评的正统理论。道家的思想，富于玄妙与神秘的成分，他们的脑里，都有一个理想的世界，寄托他们的灵魂。这种世界非出于人力创造的现实，乃出于脑力理想的构成，借以表现的，或出于言语，或出于辞章。言语者趋于清谈，辞章者尊重文艺。屈原的《离骚》，在有道家思想的淮南王的眼里，立刻发现其价值的重大，批评它说：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悱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蝉蜕浊秽之中，浮游尘埃之外，皜然泥而不滓，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这批评就在现在看来，也还是相当确切的。所谓“蝉蜕浊秽之中，浮游尘埃之外”，正是道家的心境。到了班固，站在儒家的立场，对于屈原以及淮南王的评论，都加以非难。他用儒家的德行论，说屈原露才扬己，不善于为人；几次责难怀王，不善于为臣。前者是失德，后者是不忠。一个失德、不忠的人，他的辞章，就是再美丽，也是不足观的了。他同时又责备作者在《离骚》内，

增损古代帝王的事实，不合于正道。并且还滥用许多荒谬虚无的神话典故，都是违反先圣先贤的经典。因此他得着结论，“淮王谓之兼风雅而与日月争光”是不对的了。在他的理论里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要点：（一）在估量作品的艺术的价值之前，应该先审查作者的品行。（二）好的作品应该是现实的，不是浪漫的。应该合于先圣的伦理观念，不应该只是个人情感的表现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知道儒、道二家对于文艺的观察的态度，根本是相反的。道家是以艺术批评为基础，儒家是以伦理道德为标准。

到了王逸，他一面觉得《离骚》确实是一篇很有价值的作品，同时又不能反对班固的议论。他只好用《诗序》解《诗经》的办法，把儒学的理论，装进到《离骚》内面去，于是《离骚》的价值就提高了。他说：

夫《离骚》之文，依托五经以立义焉。“帝高阳之苗裔”，则“厥初生民，时惟姜嫄”也。“纫秋兰以为佩”，则“将翱将翔，佩玉琼琚”也。“夕揽洲之宿莽”，则《易》“潜龙勿用”也。“驰玉虬而乘鸢”，则“时乘六龙以御天”也。“就重华而陈词”，则《尚书》“咎繇之谋谟”也。“登昆仑而涉流沙”，则《禹贡》之“敷土”也。故智弥盛者其言博，才益多者其识远。屈原之词，诚博远矣。自终没以来，名儒博达之士，著词造赋，莫不拟则其仪表，祖式其模范，取其要妙，窃其华藻，所谓金相玉质，百世无匹，名垂罔极，永不刊灭者矣。

（《离骚章句叙》）

这样加以解释，则《离骚》在思想上合于忠孝君臣之道，而其行文造句，无不适合于经典的源流了。经过了儒家伦理化的工作以后，再给它以“百世无匹，名垂罔极”的赞语，也就无人反对了。《诗经》儒化于前，《离骚》儒化于后，于是这两种纯文学的诗篇，都关在儒家的铁笼里了。

王充虽是儒家，他的思想，却带有很浓厚的道家色彩。因此他一方面承认儒家的伦理，同时他又尊重文学的价值。他觉得儒家所讲的德行，只能见之于行为，若要传之于后世，必赖于文章。诸子的学说，比不上儒家的思想，他们能传于后世而不消灭者，就是因为他们有其可传的文章在，可知文章与道德是平

行的、并重的，不能有所轻重。他深深地痛恨那些皓首穷经的学究，自己没有一点思想，又写不出好的文章来，只是集徒解经而已。他在《书解篇》说：“著作者为文儒，说经者为世儒。……世儒当时虽尊，不遭文儒之书，其迹不传。”又在《超奇篇》说：“能说一经者为儒生，博览古今者为通人，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，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。儒生过俗人，通人胜儒生，文人逾通人，鸿儒逾文人。”在这里他很明显的表示著作的儒家要比解经的儒生高明得多。儒家要从事著作，文章不尊重不研究是不行的。并且文章有“载人之行传人之名”的用处，还有“善人愿载，思勉为善；邪人恶载，力自禁裁”的伟大力量，所以“极笔墨之力”，能“定善恶之质”，文章本身有这么大的效果，有这么大的价值，这如何可以轻视呢？他这些理论的归结，虽说没有离开儒学的范围，但他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已经很尊重，不是扬雄那种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态度了。这时候文学虽还不能从儒学的桎梏中完全脱离出来，但它已具有分离的觉悟与准备，只在等待着机会的到来了。

从建安到魏晋，是儒学最衰微的时代。新兴的思想家们，对于儒家和儒学，有的加以幽默的嘲笑，有的加以正面的攻击，还有的在行为上表现种种的破坏礼法的放浪行动，好像是要故意扫儒家的面子似的。当日的儒家虽偶有一两人发发议论，但大势已去，不仅没有反攻的力量，连保守也是没有办法的了。因此道家、佛学以及道教的各种思想，占领了全学术界。文学也就乘着这个解放自由的好机会，同儒学宣告独立了。由汉代的伦理主义，变为魏晋的个人主义，再变为南朝时代的唯美主义了。从这一点讲来，魏晋时代在文学史上，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。

对于这个文学独立运动首先发动的人，大家都知道是曹丕。他虽是做了皇帝，但他那种旷达的性格，锐敏的情感，天赋的聪明，使他在文艺上发生了极大的兴趣。他认为人命利禄都是过眼的云烟，只有文艺才有永久存在的生命。在他那篇有名的《典论·论文》内，发表了许多对于文学可贵的见解。他首先叙述了对于建安七子的作品的品评，在这些品评里，完全脱了儒家的伦理观念，只以

气势与个性为标准。其次，他对于文学的对象，有离开六艺而注重纯文学的倾向。他说：“夫文本同而末异。盖奏议宜雅，书论宜理，铭诔尚实，诗赋欲丽。”奏议、书论是散文，铭诔、诗赋是韵文。宜雅宜理尚实欲丽，说得虽是简单，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对于文体的性质分辨得很清楚，而下的字眼也是非常确切的。在这里看不见宗经原道的意思，也没有班固那套正统的伦理观念，脱尽了儒学的桎梏，自由自在地说几句干净话，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。在后面虽有“西伯幽而演《易》，周旦显而制《礼》”，这只是著作可以传世的证明，与宗经原道没有什么关系。其三，他觉得文学的本身有他独立存在的生命，他的价值和用处，都非常重大。他说：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，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一身。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，见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在这些话里，已经有艺术至上主义的倾向，对于纯文学的发展，是要给予以重大的影响的。

自曹丕开了论文的风气，继续着这种工作的人就多了。曹植的《与杨德祖书》，应玚的《文质论》，刘桢也发表过论文的意见，可知论文在这时已成一种风气。不过这些没有什么新颖的理论，略而不谈，现在我们的眼光，不能不转到晋朝陆机的《文赋》上面去。《文心雕龙·序志篇》评论《典论·论文》密而不周，这话是不错的，但在陆机的《文赋》内，把这缺陷大部分给他补偿了。那篇文章因为出自赋体，读时有一点令人感着迷离，抓不住要点似的。只要稍稍细心，他的中心思想还是可以看得清楚。

（一）内容形式的两全 汉儒对于文章的观念，着重内容，所以贵重义理。陆机觉得文章的内容虽是可贵，但其形式的美丽，也不可忽略。他说：“理扶质以立干，文主修以结繁。”又说：“辞程才以效技，意司契而为匠。”又说：“其会意也尚巧，其遣言也贵妍，暨音声之迭代，若五色之相宣。”他不仅主张用意修辞要尚妍巧，就是在声音方面，也要给以音乐的美感的。他这种思想，可以看作齐梁时代声律论的先声。

（二）好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有情绪的感应 文学纵有美丽的形式，若无真实

的情感,作品仍是没有活跃的生命。如应制的诗赋、应酬的寿序之类,我们看了觉得枯燥无味,就是这个原因。故他说:“遵四时以叹逝,瞻万物而思纷,悲落叶于劲秋,喜柔条于芳春。……慨投篇而援笔,聊宣之乎斯文。”因时节事物的刺激,都可以使人生出情感,生出艺术创作的冲动性。到这时候援笔作文,一定可以达到如他说的“思风发于胸臆,言泉流于唇齿,文微微以溢目,音泠泠而盈耳”的境地了。这就是《诗序》中所说的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的意思。若心中并无哀乐之情感,而强于歌咏,则其情状必如他所说的“六情底滞,志往神留,兀若枯木,豁若涸流”的困境了。

(三) 想象力为文学重要的生命 文学虽贵于现实的取材,而必得经过想象力的组织与锻炼,始能达到艺术的成就。若专靠经验实感,其结果难免平凡与薄弱。故他说:“其始也皆收视反听,耽思傍讯,精骛八极,心游万仞。其致也,情瞳蒙而弥鲜,物昭晰而互进。倾群言之沥液,漱六艺之芳润,浮天渊以安流,濯下泉而潜浸。于是沈辞怫悦,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;浮藻联翩,若翰乌缨缴而坠曾云之峻。”又说:“罄澄心以凝思,眇众虑而为言。笼天地于形内,挫万物于笔端。”他在这里告诉我们,丰富的想象力,可以“精骛八极,心游万仞”,可以笼天地,挫万物,伟大的作家,没有不依赖这种想象的。

(四) 反模拟 文学的有永久生命,因为它在表现方面有它独创的个性。抄袭模拟的东西,无论你的技巧怎样高明,难免是优孟衣冠,终无永久存在的价值,不能为人所重视。陆机也注意到这一点,他说:“虽杼轴于予怀,怵他人之我先。苟伤廉而愆义,亦虽爱而必捐。”又说:“收百世之阙文,采千载之遗韵,谢朝华于已披,启夕秀于未振。”所谓谢已披之华,启未振之秀,就是要发古人之所未发,言前人之所未言。若一味抄袭模拟,那就有点伤廉愆义了。

陆机提出来的这几点,都是文学上的基本问题。他完全离开儒家伦理观念的束缚,从纯文学的观点,发出许多可贵的议论。他这种思想,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,自然是很大的。于是大家都承认文学是一种独立的艺术,专门论文的著述,和文集编纂的著作,也就一天天多起来了。李充的《翰林论》,挚虞的

《文章流别志论》与《文章流别集》这一类的书，一定是很贵重的文献，可惜这些书都已散失，流传下来的一鳞半爪，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。

陆机的文学思想，我们可以看作文学建设的理论。但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学观，加以破坏和攻击的，是称为道教徒的葛洪。葛洪因为有道士的臭味，一向被人轻视，但他在魏晋文学的批评史上，却有重要的地位。他虽是道教徒，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学者，对于老庄的哲学了解很深，他能以老子的自然论与庄子的进化论，应用到文学观念方面去，所以他的见解，击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，而发出清新自由的理论了。

（一）德行文章并无本末之分 儒家的传统观念，把德行看为根本，文章是枝末。文章再做得好，也只是骋辞耀藻，无补救于得失。所以儒家把文学看作是玩物丧志的小道，没有什么意义的，葛洪却大胆地推翻了这种理论。他说：“文章之与德行，犹十尺之与一丈，谓之余事，未之前闻。夫上天之所以垂象，唐、虞之所以为称。大人虎炳，君子豹蔚。昌、旦定圣谥于一字，仲尼从周之郁，莫非文也。……且夫本不必皆珍，末不必悉薄。譬若锦绣之因素地，珠玉之居蚌石。云雨生于肤寸，江河始于咫尺尔，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，未可呼为余事也。”（《尚博篇》）文章与德行，正如一个半斤，一个八两，有什么轻重之分。天地万物各有其文彩，也各有其用处。若以日月之光的实用，而轻视其文彩，这观念自然是错误的。人有德行，正如日月之有光明；有文学，正如日月之有文彩，我们怎可有本末之分。即有本末之分，本不必皆珍，末不必悉薄，也不能作为轻重的标准。并且他还进一步说：“德行为有事，优劣易见。文章微妙，其体难识。夫易见者粗也，难识者精也。夫唯粗也，故铨衡有定焉，夫唯精也，故品藻难一焉。”（《尚博篇》）德行见于行为，大半是出于做作，容易讨好。文学出于表现，大半由于天才，其术难精。故德行粗浅，而文学精深。由这点看来，文学的艰苦微妙，反在德行之上了。他这种议论，确实是大胆的革命的，他把儒家作为命根的德行看作是粗浅的东西，历来不敢动摇的德本文末的观念，也被他推倒了。这种思想，不在老庄学说极盛儒学衰微的晋代，是决不会产生的。

(二) 文学是进化的 儒家向来还有一个传统观念,认为什么东西,都是今不如古,养成一种自卑的复古的心理。称圣人必曰周、孔,称帝王必曰尧、舜,称文章必讲《尚书》,称诗必道《三百篇》,他们的理由,是“古之著书者,才大思深,故其文隐而难晓。今人意浅力近,故露而意见。以此易见比彼难晓,犹沟浍之方江河,蚁垤之与嵩岱矣。”这种理由,葛洪觉得是大错的。他在《钧世篇》说:“盖往古之士,匪鬼匪神,其形器虽冶铄于畴曩,其精神布在乎方策。情见乎辞,指归可得。”他首先要破坏对于古人那种盲目崇拜的心理。古人并不是鬼也不是神,他也同我们一样,是一个平凡的人。他们的作品精神,我们还可以见其情意,可以看出其真形实状。这种民主的解放的精神,是非常可贵的。至于说古文隐而难晓,今文露而易见,这并不是古文优于今文的标准,反是今文优于古文的证据。文章的用处,是以情感人,愈能通俗化,它的力量就愈大。若都像古文的隐而难晓,那文章等于无用了。并且古文的隐而难晓只是时代变迁语言杂乱的原故,与才大思深绝无关系。今文的浅显美丽,正是文学进化的结果,既不是今人的才疏也不是力浅。故他说:“古书之多隐,未必昔人故欲难晓,或世异语变,或方言不同,经荒历乱,埋藏积久,简编朽绝,亡失者多;或杂续残缺,或脱去章句,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。”又说:“且夫古者事事醇素,今则莫不雕饰,时移世改,理自然也。”他用时代的变迁,说到文学的进化,用言语不同,章句残缺,古事醇素,今事雕饰种种合理的见解,来说明今古文章不同的原因。这种观念,既合进化论的科学原理,其论点又非常正确,比起儒家那种盲目的拜古主义来,真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了。

他根据这种文学进化论的原则,断定今文不仅不劣于古文,反要比古文华丽华彩。他说:

夫《尚书》者政事之集也。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、军书、奏议之清富赡丽也。《毛诗》者华彩之辞也,然不及《上林》《羽猎》《二京》《三都》之汪涉博富也。……其于古人所作为神,今世所著为贱。贵远贱近,有自来矣。故新剑以诈刻加价,弊方以伪题见宝也。是以古书虽质朴,而俗儒谓之堕

于天也。今文虽金玉，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。（《钧世篇》）

庸人俗士，自己不敢主张，只凭耳闻不用眼力，于是演出凡古皆神无今不劣的可笑可怜的见解了。葛洪骂那些人为俗儒，实在是对的。他接着又说：

若夫论宫室，而奚斯《路寝》之颂，何如王生之赋《灵光》乎？同说游猎，而《叔畋》《卢铨》之诗，何如相如之言《上林》乎？并美祭祀，而《清庙》《云汉》之辞，何如郭氏《南郊》之艳乎？等称征伐，而《出车》《六月》之作，何如陈琳《武军》之壮乎？则举条可以觉焉。近者夏侯宽、潘安仁并作补亡诗，《白华》《由庚》《南陔》《华泰》之属，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，咸谓古诗三百，未有足以偶二贤之作也。且夫古者事事醇素，今则莫不雕饰，时移世异，理自然也，至于属锦丽而且坚，未可谓之减于蓑衣，辘辘妍而又牢，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。……若舟车之代步涉，文墨之改结绳，诸后作而善于前事，其功业相次千万者，不可复缕举也。世人皆知今之快于曩矣，何以独文章不及古耶？（同上）

他这种一步进一步的论断，使得那些俗儒，是无法反攻的。现在许多卫道的先生们，爱用电灯电话，一提起白话文学就深恶痛绝，望见洋装书就头痛，在一千多年前的葛洪看来，不是要大笑人类思想的不长进吗？

葛洪因为是思想家，在他的眼里，比起文学来，他是较为重视哲学的。所以当他把文哲二者同时并论的时候，他说过诗赋细文、子书深博的话。就二者性质上的比较，这评语并不苛刻。这些话一点无损于他的独特的文学见解，一点不显出矛盾的弊病。他在魏晋的文学批评界，对于儒家的文学观，下了激烈的总攻击，击破了儒家两个最坚固的堡垒——一个是德本文末，一个是贵古贱今。而得出“德行粗浅文艺精深”，文学依着进化的原则，“今胜于古”的两个最大胆最新奇的结论。在文学思想方面讲起来，陆机的理论属于纯文学的建设，葛洪是对于旧观念的破坏，但在那种新旧思潮交替的时代，葛洪的工作与价值，是较为重要的。同时我们可以知道，魏晋的文学，能完全脱离儒家的桎梏，向个人主义，自由主义方面发展，是有其学术思想的背景与原因，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

象。到了南朝,大批论文的专书出现,唯美主义的产生,这只是魏晋思想的进化,一点没有什么可惊奇可责备的了。

二、时代生活的反映

文学是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的反映。能够把那时代的生活意识用文学的形式,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得愈是真切,其作品的生命愈是活跃,其力量愈是伟大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,文学作品是可以看作文化的历史的,文学家也可以看为历史家。建安、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动摇,农村的破产,商人的奢侈,富豪的剥削,战争的痛苦,外兵的侵入,政治的混乱黑暗,阶级制度的严格,这种种情形,我在上面都略略谈过,现在也无须详说了。然而这种社会现象,一反映到文学作品里,那种如画的情境,比起历史的记载来,要真切得多动人得多了。

蔡琰的《悲愤诗》,是一篇五百四十字的五言叙事诗。这种诗体,在建安时代已经成熟了。有人怀疑这首诗不是蔡琰所作。关于作者问题,我不应该在这里讨论。但是我们断定它是建安曹魏时代的作品,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的。在这篇诗里,作者叙述在董卓称兵作乱的时候,匈奴乘机进来,掳去了不少的中国人,蔡琰也在内。她在匈奴住了十二年,生了两个儿子,后来曹操设法把她接回来,她到家一看,那已经是人亡家破景象全非的悲惨的情景。她到这时候,已经没有再活下去的勇气了。

在这篇诗里,作者有几段动人的描写:

(一) 外兵对于汉人的虐待 “平土人脆弱,来兵皆胡羌。猎野围城邑,所向邑破亡。斩截无子遗,尸骸相撑拒。马边悬男头,马后载妇女。长驱入西关,回路险且阻。还顾邈冥冥,肝脾为烂腐。所略有万计,不得令屯聚。或有骨肉俱,欲言不敢语。失意几微间,辄言毙降虏。要当以亭刃,我曹不活汝。岂复惜性命,不堪其詈骂。或便加捶杖,毒痛参并下。旦则号泣行,夜则悲吟坐。欲死不能得,欲生无一可。彼苍者何辜,乃遭此厄祸。”君权衰落,军阀作乱,外兵乘机

而入，屠杀掳掠，结果吃苦的还是无辜的小百姓。马边男头，马后妇女，把那游牧民族的本色，表现得很是真切。

(二) 理智感情的冲突 蔡琰在国外十二年，思乡怀国的情绪是时时袭着她的心灵的。但一等到有回国的机会，对于她那两个亲生的儿子，又舍不得离开，在这里产生出理智和感情的激烈冲突。“儿前抱我颈，问母欲何之。人言母当去，岂复有还时。阿母常仁恻，今何更不慈。我尚未成人，奈何不顾思。见此崩五内，恍惚生狂痴。号泣手抚摩，当发复回疑。……去去割情恋，遄征日遐迈。悠悠三千里，何时复交会。念我出腹子，胸臆为摧败。”在这胡儿的问话，既是天真，又是悲苦。世界上只有爱情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的。但是蔡琰在那时不能不忍着哀伤，用理智用公义去克制私人的情感。她心灵中那种激烈的矛盾的冲突，比她当年被掳时候所受的痛苦，不知道要深切多少倍了。

(三) 回家以后的情景 离开爱儿，回到本家，那情形是如何的呢？“既至家人尽，又复无中外。城郭为山林，庭宇生荆艾。白骨不知谁，纵横莫覆盖。出门无人声，豺狼号且吠。”十二年回来，家乡的情状变成了荒凉世界，房屋成了森林，满眼都是暴露的尸骨，四无人声，只听见豺狼的号吠。这不是一幅建安时代北方社会的写实图画吗？这不是一张战乱以后的农村现象的照片吗？在这里，有军阀的作乱，有胡人的掳杀，有胡汉人种的混乱，有社会现象的描写。读了这种文学作品，留给我们的印象，比一部正史给我们的是更要生动更要有力的了。像这种作品，除了文学本身的价值以外，是还有历史的价值的。

再如曹操的《蒿里行》、曹植的《送应氏》、王粲的《七哀诗》、陈琳的《饮马长城窟》诸诗，都是反映当日离乱生活的好作品。“铠甲生虱虱，万姓以死亡。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，念之断人肠。”（《蒿里行》）像曹操那样的好汉，眼看了这种凄惨的情境，也不得不发生深深的叹息了。曹植的“洛阳何寂寞，宫室尽烧焚。垣墙皆顿擗，荆棘上参天。不见旧耆老，但睹新少年。侧足无行径，荒畴不复田。游子久不归，不识陌与阡。中野何萧条，千里无人烟”（《送应氏》），王粲的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。路有饥妇人，抱子弃草间。顾闻号